

□马有福

青稞何以香江源

——味蕾深处的青海之一

身在江源,曾经的我没有感受到青稞的香味。这是因为,小时候一天三顿吃的都是青稞面,青稞养大的生命早就失去了对于这种救命庄稼的敏感与记忆。相反,不吃青稞的这二十年还沉浸在告别之后的庆幸中,早忘了那一段的贫寒岁月。那时,走亲访友如果偶尔在亲戚家吃到了渴盼已久的白面或者米饭,那简直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就是那些瞬间沉浸在味蕾深处的感觉至今依旧隆起在记忆深处而占据了童年记忆的半壁河山。多少次与幼时的玩伴们回味这一切,总觉得青稞与贫寒是扯不开关系的。

就这样背对青稞又是几十年,但青稞依旧跟随我们,形影不离地跟到了城市。在我们发现了“三高”,感觉到种种不适之后,第一时间,它又来到了我们身边,伸出了一双不离不弃的手。青稞面干粮、青稞饼、破布衫、青稞麦索、青稞糌粑、青稞酒、青稞醋。青藏高原哪能摆得脱了青稞的滋养?在回族人、撒拉族人的手下青稞更是再一次风生水起,成为尝鲜、待客、平素食用不可或缺的优质食物。

城乡超市里少不了青稞面粉。大小餐厅的菜单上一打青稞饼、一窝破布衫更是客户首选。

流动商户的手推车哪能没有青稞面干粮和洒一路面香的青稞糌粑?

互助的青稞酒、湟源的青稞醋已经成为青海名优产品。

青稞再次活跃在青海美食大家庭中。在营养过剩年代,肩负起了亦药亦食的重任,刷新了青海美食纪录,并成为青海美食家族中最为亮眼的食物。

从姿态上说,青稞是腰身最低的植物,同时也是功劳最大的庄稼。无论怎么荒寒的环境,就是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雪线下,只要有一把土,一点阳光,它就能生根发芽奉献出一茬庄稼,给人以耕种的希望。

在我的记忆里,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那些在风中摇曳的青稞穗头就像那双双伸出的友谊之手一样,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身子最早送到了村庄的眼前。看到它们摇曳的身姿,我们村的庄稼人就像听到了天穹的神谕,就会潜入其中,摘下一把把穗头,揉搓起来,尝鲜田野。这还不够,回家的时候,他们还要把成捆的穗头拽下来带到家里烧、煮、揉、筛,加工成柔软青绿的湿青稞,或者用小石磨拉成寸许麦索,炆油改善生活。这两种食物的共同特点是鲜、嫩,带着大地的湿气。但其吃法却有所不同,前者的吃法讲究的是原汁原味,有点像吃瓜子,一粒一粒地在咀嚼中感受麦香。而麦索却是用清油炆莜莜或者熬成粥食用的,讲究的是与清油等其它食材的搭配与混合。这些都是季节性很强的食物,一般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

这个店的。但心细的人家却喜欢把麦索晾干妥善存,也有跨季节泡软熬粥食用的。一碗麦索粥每每使我们提前享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在青海,最会吃青稞的当属门源人了。我想,这与门源大面积种植青稞有关。门源是祁连山腹地土地最宽最凉的地方,也是被大坂山遮住阳光后比较凉爽湿润的地方。这使门源天然地成为青海省最有名的小油菜种植基地、青稞种植基地。正因此,门源人烙出的青稞干粮香脆可口、软硬适度,有点像点心。如果经冻烤消,再带一点火色,那味道酥酥脆脆,经嚼耐品,实属难得的家常美味。如是家里来客了,门源人则少不了烙青稞面油饼,搓青稞面鱼儿,变着法子让客人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温馨。青稞面可能是面粉最差的面粉,要想用它擀成一案像样的寸寸面,那无异于攀登蜀道,任谁都是一座大山。于是,擀面的女人们常常把手下的一案青稞面形象地叫做破布衫。这破布衫,一片一片的很难凑成一张整体。但这并不影响她们每天晚饭都是一锅薄饼细切、飘着葱花香的破布衫汤。这是家常饭,断不能以此招待客人。所以,一旦来客,她们就会和面搓鱼儿,做一锅就像小鱼畅游一样的青稞面鱼儿,算是变了花样地招待客人。至于烙几张冒着小油菜香气的青稞面油饼则更不在话下。

青稞成就了门源人,也成就了青海人。我们小时候,我们那儿的人每每说起青稞饭时,总为门源人竖起大拇指,也总模仿着他们不断变换青稞面的食样,创出了我们自己的特色。让我自豪的是,我的奶奶和妈妈都能拿青稞面擀出胳膊长的长面,也能用青稞面捏出饺子。还常常炒青稞麻麦加麻籽作我们的零食,这使我被青稞包围的童年生活有了更多值得回味的地方。

互助人面对丰收后的青稞,不知从何时起萌生了做酒的想法,从原生态的酪馏酒坊到现代化的大酒厂,生产的不同系列的青稞酒已经成为名牌。湟源人则把青稞融入他们擅长的酿醋技艺中,让青稞透出了别样的高原清香。不擅于务农的青海各地的各族游牧人更是把青稞糌粑请进了他们的帐篷之中,存放在燃烧牛粪的土灶前,成为他们一日三餐的主食。有意思的是,告别了草原的藏族人们每进城市的藏餐厅,点再多的菜,也总少不了点一碗垫底的青稞糌粑。一旦到了斋月,好多穆斯林家庭的早餐也都是一勺酥油一碗糌粑。糌粑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一种文化了。要不,我的兄长为什么对我俩在祁连山腹地的托茂阿嘎家吃过的那一碗糌粑念念不忘?至于如今的我,青稞面食物不仅于降糖大有裨益,更是长青在情感深处的万亩良田。



青稞丰收了。

马成云 摄



沉甸甸的青稞麦穗。

晁生林 摄

关注

周末漫笔

辞旧迎新,虎去兔来。今年是农历兔年,街头巷尾到处都能看到兔子的形象,可爱的小兔子正蹦蹦跳跳向我们走来。兔是中国人喜爱的动物,它近在我们的身边,又远在天穹的一轮明月之中。

兔子的形象是温顺、平和、优雅、不争的,但这其实只是兔子的一面;兔子还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强健、敏捷、机警、不屈。兔以奔跑速度快而著称,古人在造字时,把兔子跑得快,称为“逸”。《说文解字》在解析“逸”字时,指出兔子“善逃”。兔子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跑步冠军。古人有言:“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这话本来是说用兵之道。两军对战之前,要如未出阁的女子一样沉静,使敌人放松警惕。两军开战之后,则兵贵神速,出击要像兔子一样迅速,使敌人猝不及防。后来,“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也常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张弛有度,懂得何时静何时动,静时纹丝不动,动时眼疾手快。

关于兔子的成语故事,最著名的可能就是《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了。韩非子用这个�故事告诫世人,如果死守狭隘的教条不知变通,那就只会导致失败。

兔年说兔

王瑞菊

兔子又是一种非常敏捷的动物,《孙子兵法》中就用“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说明军队的行动要像兔子一样急如闪电,让敌人来不及反应。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木兰辞》中有这样的句子:“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意为雄兔与雌兔虽然有细微的差别,但跑起来的时候却让人难以分辨。古人对兔子特性的观察细致入微由此可见一斑。《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对赤兔马做了这样热情洋溢的称许:“奔腾千里荡尘埃,渡水登山紫雾开。掣断丝缰摇玉辔,火龙飞下九天来。”用“赤兔”来命名这样一匹英姿勃发、战力十足的马,可见人们对于兔子的行动迅速印象之深。

兔是常见的猎物。唐代诗人王建曾在《宫词》一诗中写过如下诗句:“新秋白兔大于拳,红耳霜毛趁草眠。天子不教人射杀,玉鞭遮到马蹄前。”意思是说在宁静美好的初秋时节,那“红耳霜毛”的小兔,在秋草中美美地酣睡呢。由于它的幼小和睡态“可掬”,竟使以捕杀生灵为乐的天子也顿生爱怜之情。作者通过天子的态度和作为,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小白兔的静美与可爱。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被贬滁州,写下尽人皆知的千古名篇《醉翁亭记》。不为人知的是,他在滁州还偶然获得了一只兔,并将其带回汴京。欧阳修有《白兔》诗曰:“天冥冥,云蒙蒙,白兔捣药捣娥宫。玉关金锁夜不闭,穿入滁山千万重”。嗚呼!这白兔原来是从忘了关门的月宫中窜到滁州的。欧阳修为这只白兔先后两次邀请诗友聚会,来的都是后来载入文学史的大家名流:王安石、苏洵、梅尧臣等,且各人都有相关诗作流传。欧阳修在诗中感叹:“天资洁白已为累,物性拘囚因无益。上林荣落几时休,回首峰峦断消息。”这几句诗,与其说是写白兔,不如说是写他自己,道尽了他“欲采苹花不自由”的惆怅和郁闷。

民间也流传着许多与兔子有关的神话和故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古人为清冷的月宫安排了吴刚、嫦娥,安排了玉兔、蟾蜍。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各司其职,各得其所。但是往深里一想,玉兔怎么到了月宫,又怎么捣起药来?诸如此类的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屈原的《天问》一口气问了172个问题,其中就有这样两个问题:“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夜光指月亮,月亮何德何能,竟能缺了又圆?月亮贪图什么好处,让顾菟在它的腹中?“顾菟”二字究竟指什么,学者的看法不尽一致,有些人认为顾菟指顾盼的兔子。月中有兔,这在汉代已基本形成共识。与月中有兔相对应的是日中有鸟,不过这说的可不是一般的乌鸦,一般的乌鸦只有两条腿,而日中金乌却有两条腿。按照古人的阴阳观念,日为阳,月为阴,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所以日中金乌便有两条腿,而月中玉兔本来就是四条腿。

汉代画像砖上反复出现玉兔捣药的图像,但大多数时候,陪伴在玉兔身边的是西王母。西王母住在昆仑山,有长生不老之药,而玉兔所捣之药就是长生不老之药。汉代之后,西王母传说的影响力逐渐下降,或许,这成为了玉兔前往月宫捣药的缘由和契机。玉兔与月亮的联系,浪漫而富有诗意。这种诗意,今天已被写入了中国人的探月工程。2013年12月,嫦娥三号着陆月面,其巡视器月球车的名字就叫“玉兔号”。2019年1月,玉兔二号首次驶抵月球背面。可以肯定,未来,“玉兔”还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孩子们都喜欢兔子,喜欢“小白兔与大灰狼”的故事,喜欢兔兔赛跑的故事,爱玩“小兔子拔萝卜”的游戏,爱唱“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白菜,蹦蹦跳跳多可爱”的经典儿歌。大人听到这些儿歌,也难免会想起自己的童年生活,牵出一段童真可爱的儿时回忆。

在可爱的兔年,愿大家都做一个可爱的自己,并将温暖与爱传递出去。

□通文

三川书院:青海历史上的第一座书院

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主要开展教书、读书,兼及藏书、修书、辩论等活动,书院产生于唐代,成熟于宋代,普及于明清,止于清末,它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的重要形式,但与官府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

书院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传承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中国最早的书院是唐玄宗时期洛阳的丽正书院,正式的书院教育制度则是由朱熹创立,形成、发展于宋代。

青海地区书院的历史比较短,规模也相对较小。清乾隆元年(即1736年)的冬天,时任西宁道金事的杨应琚在大通白塔城(今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城关镇)创办三川书院,开青海地区兴办书院的先河。杨应琚是青海地区很有作为的官员,后任陕甘总督、云贵总督。青海地区是他从政的起始地,他在青海创办书院,编纂方志,向西宁周边移民开垦,政绩卓著。

乾隆三年(1738年),杨应琚参考白鹿洞书院的管理制度拟定了《大通三川书院学约九条》,遵循“敦延名师,昼夜惟勤,寒暑无间”办院理念。要求学生行“圣贤之法”,求“诗书之经义,明忠孝之大端”,提倡“闭门潜修,同人砥砺”的学风。针对当时大通地区不重视文化教育,“文教不兴”的状况,劝民读书,规定“一家三子,择俊秀者一人入学肄业”,一户人家有三个孩子的,要选择一个孩子去书院读书。“气禀孱弱,力不能胜任稼穡者,尤宜读书勤学,奋志青云”,身体不够强壮,不能干庄稼活的孩子,尤其适合去读书做学问。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大通卫改为大通县,县城设在白塔城。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大通地区又相继创办了大雅书院、崇山书院、泰兴书院等书院。

道光九年(1829年),当时的大通知县张于淳,在县城东关修建上房5楹,讲堂3楹,斋房40余间,前后3院,共有房舍50余间,创办了大雅书院。咸丰二年(1852年),

知县哈甸丰和地方绅士孔廷俎、马廷伟等人对大雅书院进行了修缮。同治四年(1865年),大雅书院毁于战火。

同治十二年(1873年),当时的大通知县,湖南湘乡人黄仁治多方筹款,派地方绅士董侯选、教谕梅魁、贡生张锦文、附生张海鲤等人,在大雅书院的旧址上重新修建书院,并更名为崇山书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崇山书院毁于战乱。第二年,知县史文光筹款,统带祥子营、何得彪捐资,重建了崇山书院,后又被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当时的知县,福建侯官人万钟驥申请公款,在大通县城西关创办了泰兴书院,先后聘请大通县贡生梅汝廉和西宁举人蔡廷基为主讲,岳树声担任书院训导。

在大通三川书院的影响下,青海地区又相继创办了8所书院,有今西宁市区的凤山书院,循化的龙支书院,以及大通的大雅书院、崇山书院和泰兴书院。大通也成为青海历史上创办书院最多的地区。这些书院具有明显的官学印记,书院的负责人叫“山长”,由官府委任。书院的办学经费除地方乡绅募集以外,主要由官府拨款支付。

清代是青海地区学子参加科举考试

最多的时代,据研究者贾伟和李臣玲统计,清代青海东部地区参加殿试、乡试的举人有432人,其中西宁市最多,有274人,但大都出自外来官宦人家,其次就是大通县,有66人,占到总人数的七分之一,这都得益于大通县先后创办的这些书院。

1905年,盛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考试废除,清政府实行“废科举、兴学堂”教育改革,书院全部改为新学堂,大通县泰兴书院也改为大通县高级小学,1911年建立民国后改为大通县第一高级小学。西宁市区的湟中书院到1906年改为新式学堂,成为青海地区最后一个书院,当时湟中书院的山长是大通县谢以刚。因此青海地区的书院教育开端于大通之地,终结于大通之人。

书院教育注重道德修养,将知识传授、学术研究与品性修养、人格完善有机结合在一起,它对学风士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理观念的养成等都具有积极意义。书院教育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使清代文教晚开的青海地区学不不进、业不加修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提倡文化教育的风气逐渐流行,对培养人才和引导社会文明风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